

# 新冠肺炎與女性再現： 臺灣主流新聞報導裡的性別落差\*

王淑美\*\*

## 摘要

新冠肺炎大流行對全球造成重大影響，女性所受衝擊比男性更深。本研究蒐集臺灣三家報紙新聞媒體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間的疫情相關報導，採用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檢視新聞如何呈現女性及其所負擔的照顧責任，並與三家獨立網路媒體之報導對照。研究發現，疫情期間有關女性處境之報導數量微乎其微，報紙多將相關新聞刊登在次要版面，以照顧者、消費者、受害者等角度再現女性，忽略結構性問題，並暗示女性應解決自己的問題。

**關鍵詞：**女性、母親、性別落差、紓困政策、新聞論述、新冠肺炎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提供寶貴建議，使文章更加完善。

\*\* 王淑美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 sw@nccu.edu.tw。

投稿日期：2021/09/10；通過日期：2022/04/20

## 壹、研究背景

自 2020 年起，新型冠狀病毒引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全球大流行（the Covid-19 Pandemic, 簡稱新冠肺炎），多國政府採取封城、停課、居家隔離的方式來因應，試圖杜絕病毒傳布，同時許多企業也因此歇業倒閉。國際媒體報導與研究論文，已有不少談及疫情對女性造成的衝擊比男性更深，包括女性失業率更高，需兼顧教育與照顧子女、食物烹調採買、料理家務等責任，部分企業採取遠距上班，但母親難以身兼多職，也有報告指出女性因此遭受更多家暴（Ertan, El-Hage, Thierree, Javelot, & Hingray, 2020）。

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在 2021 年 5 月之前，因防疫措施效果良好，無大規模、長時間的封城，學校沒有長期停課，能盡量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2021 年 5 月起因疫情升溫，大學以下學校停課，鼓勵居家辦公，並陸續宣佈更嚴格的預防措施，人們自主避免出門以免病毒蔓延。但是疫情在臺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是否具有性別差異？亦即，女性與男性所承受的衝擊程度不同？相關問題討論有限。

實際上，臺灣社會也是由女性負起絕大部分照顧責任，2020 年疫情初起買不到口罩、延後開學的時候；2021 年 5 月起進入三級警戒，政府宣佈高中以下不到校、補習班安親班全面停課，家人染病或需要居家隔離的時候，母親們也往往是最感到焦慮，且需付出最多時間、勞動與情感來因應變動的家庭成員。此外，疫情中受到重創的餐飲業、旅遊業等，女性從業人員比例較男性高，女性勞工因此面臨解雇或無薪假的情況，也可能比男性更嚴重。

性別平權運動推動已久，但兩性落差持續存在。尤其在私領域，不成比例的照顧重擔落在女性身上，除了工作還有家務，夾在多重身份與責任間，深感時間不夠用的焦慮。由於照顧工作佔去多數時間以及精力，許多女性陷於職場劣勢，也更容易受困於貧窮（Wright, 2009）。病毒的侵襲固然不分性別，但疫情危機對女性的衝擊可能更甚於男性，由於臺灣社會及學界對此現象討論不多，本研究想要關注以下問題：傳播媒體如何呈現疫情與性別議題？尤其是臺灣主流報紙媒體，如何報導疫情對女性的衝擊？

## 貳、文獻探討

### 一、疫情加重性別不平等

新冠疫情爆發後，為阻止病毒擴散，許多國家採取封城措施，禁止人民隨意離家。當人們留在家中避疫，而女性又經常是家事與照顧工作的主要負擔者，這使得女性壓力比平時更沉重，多國研究都指出疫情對女性造成更嚴重的衝擊。聯合國婦女署副執行長 Anita Bhatia 指出，過去 25 年婦女平權運動所做的努力，可能在 2020 這一年因為疫情化為烏有（桑德琳·隆貢布、阿梅莉亞·巴特，2020 年 11 月 30 日）。

多國研究已指出疫情對不同性別的衝擊有異。Fodor, Gregor, Koltai, & Kováts (2020) 詢問 18-65 歲的匈牙利人，於長達 11 週的封城期間日常生活如何進行，並比較其疫情前後的時間運用差異。在回收的 1900 份問卷中，女性花在照顧小孩的時間顯著增加，更加拉大與男性時間運用的差距。當雙親與孩子都被迫留在家，白領階級母親花更多時間照顧小孩，可工作的時間遠比父親少。兩性的家庭分工也極不平均，例如有受訪者提到丈夫說自己沒辦法照顧孩子，於是她必須自己做家事、照顧孩子還得線上教學，因此常在深夜孩子們睡著時才能備課 (Manzo & Minello, 2020)。Petts, Carlson, & Pepin (2021) 針對美國父母調查研究發現，在家工作對父親影響遠較母親為小，面臨托嬰中心、學校關閉，親友照顧等非正式管道也不再可得，帶著幼兒的母親因而工作時數銳減。

疫情期間女性的心理健康值得擔憂，因為女性擔任照顧者的角色，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也比男性更大。在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等地於封城期間進行的研究發現，性別不平等在疫情中被再生產，女性不僅更容易被減薪、裁員，心理壓力也比男性更大。母親們除了自己承受經濟與行動自由被剝奪的壓力和親人染疫的沮喪，還得安撫孩子。學校和公共場所關閉，使得母親無法帶小孩出門活動，必須長時間一同待在家裡；職業婦女們普遍為了要兼顧工作與照顧孩子而焦慮，且自責無法讓孩子有完整的學習 (Czymara, Langenkamp, & Cano, 2020; Clark et al., 2021; Manzo & Minello, 2020; Yamamura & Tsustsui, 2021)。

因為女性身負照顧責任，在疫情危機中，女性必須減少工作時數或暫時離開有酬職場才能照顧家庭。在歐盟的統計資料中，女性比男

性更常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30.2% 比 8.5%），平均而言兩性的薪資收入差距達 14.8%（Blaskó, Papadimitriou, & Manca, 2020）。勞動市場上原本就存在母親勞工薪資偏低的「母職懲罰」現象（Dias, Chance, & Buchanan, 2020），疫情期間更加明顯，尤其中低教育程度的勞工受創最重；相較之下，父親被解僱的風險遠低於母親。單親媽媽得面臨在工作與照顧孩子兩者擇一的困境，美國在 2020 年 2 至 5 月間，單親媽媽的失業率從 4.1% 跳升至 15.9%（Alon, Doepke, Olmstead-Rumsey & Tertilt, 2020）。母親為了照顧孩子在家工作通常績效不彰，可能影響其升遷機會，或者辭去工作，長期退出勞動市場，難以經濟自主，其子女未來的機會也將受阻（Fuller & Qian, 2021; Mooi-Reci & Risman, 2021; Yerkes et al., 2020）。

## 二、女性長期居劣勢的結構性問題

正如 Fortier（2020）所主張，在全球疫情之下，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嚴重衝擊，不僅因為女性原本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位置，也因為女性的社會角色，以及所負擔的照顧責任。當政府以封閉公共空間與服務來防堵病毒擴散，社會問題又被拋回至個人自掃門前雪的層次。換言之，公共服務的中斷是由家家戶戶的女性成員來取而代之，也因此讓性別平權倒退數十年。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統計，全球女性平均每天花 4 小時 25 分鐘在照顧工作，男性約投入 1 小時 23 分鐘，女性較男性負擔三倍以上時數於照顧、家務，沒有時間去爭取或從事更好的工作機會，也因此勞動參與率偏低，全球約有七億四千萬女性在非市場經濟下勞動（United Nations, 2020）。歐盟報告（Blaskó et al., 2020）顯示，不少東歐與南歐國家中，三分之二以上民意仍認為「女性最重要的任務是照顧家與家人」、「男人首要任務是賺錢養家」。<sup>1</sup> 文化規範影響勞動市場結構，因此女性從事無償家庭勞動的情況也更普遍。換言之，疫情是社會問題的放大鏡。探討疫情使平權運動倒退數十年，更應探討的是女性長期處於社會劣勢的結構性問題。

論及婦女與發展的議題，Moser（1993）提出，傳統性別分工的觀念為男性與女性工作的區隔與區別提供藉口，男性工作被賦予較高價值、領取更高薪酬，而女性工作不被重視，導致女性地位的低下。

Moser（同上引）分析女性肩負的三種責任／工作：再生產（reproductive）、生產（productive）與社群管理（community managing）工作。

再生產工作包括「生養小孩責任與家事勞動，必須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的勞動力。」（Moser, 1993, p. 29），包括生小孩與照顧及維持先生與孩子作為社會中的勞動力。再生產包括勞動力的照顧、社會化與教育，將女人歸在家內領域的意識型態，強化家庭為女人場域的論述，將女性的勞動自然化，進而無視其貢獻。實際上，這些日復一日的工作是社會得以延續的基礎，但因為再生產工作難以計價，而不被認為是「真的」工作，經常是休閒與工作難分，重複進行沒有開始或結束，也因此特性，女性工作時間往往比男性更長，卻未受到認可。MacKintosh（1981, as cited in Moser, 1993）認為，女性為了照顧孩子而依賴且隸屬於婚姻，弱化他們在勞動市場中的地位，也導致女性的低薪與貧窮現象。

生產工作是指有償勞動，具有使用價值且有交換價值，婦女的生產工作通常作為家中的第二份收入。Moser（1993）認為，世界各地仍常保有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負責賺錢、女人照顧家庭的意識型態，這影響了男性與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工資，男性可獲得更多工作機會，而女性只能選男人不做的項目。留給女性的工作機會通常是較低薪資或低技能的職位，難以進入高階管理職。在家庭企業中也常見女性擔任要職，卻是無薪勞動，導致婦女的貢獻被忽略。

社群管理工作負責社群內的資源配置、集體消費、教育等工作，經常是志願性的無償服務，也就是在「自由」時間進行的「義務」工作。相對於男性經常在社群組織擔任管理職位，有正式頭銜與收入，例如社區發展協會會長，且有助於累積未來向上升遷的政治資本，女性多半擔任基層無薪志工。由於女性總被（自）認為家庭是其優先場域與責任，因此必須是純真且無私的貢獻。Moser（1993）指出，政府、國際組織、非營利組織等推動社區服務時，經常強化了既存社區內性別分工的架構，看似公益的計畫卻建立在女性無償勞動的基礎上，更惡化性別的不平等。

傳統觀念經常將女性與母職（motherhood）劃上等號，女性被期待成為照顧者，比男性擔任更多家庭責任與勞務。近半世紀來，在各國推動教育與性別平權的努力下，雖然婦女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提

高，但女性在多數社會中依然處於弱勢，「男主外、女主內」的意識型態仍是造就兩性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各領域地位落差的主因。

Hertz (2013) 指出，過去四十年來，女性一直在經濟壓力／機會與母職意識型態中掙扎，女性總得在工作與母職之間作取捨，男性卻不需要，「『好』媽媽依舊被定義為把照護孩子作為第一優先要務的女性。」(p. 607)，從美國的數據來看，儘管男性做家事的時間在四十年間略有增長，但相對於女性被高標準要求實踐母職，父親並不被期待積極展現父職 (fatherhood)，亦未參與密集育兒實踐，而這正是母職的主要負擔。單親媽媽為了照顧孩子無法參與職場，接受訓練，也因此被困在社會經濟的底層；反之，若投入工作委託他人照顧孩子，又常被質疑未善盡母職。所謂的工作與家庭平衡對於職場媽媽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除了傳統文化價值，資本主義要求勞工全力投入、忽略性別與社會角色差異，也使女性在就業市場處於劣勢。Acker (1990) 指出，企業組織並非性別中立，高度男性主導的體制將勞工視為去身體、同質的勞動力，忽視性別差異。Collins (2019) 呼籲，所謂「工作——生活平衡」，意味著可自己「選擇」平衡處理公務與家庭壓力，然而結構並非個人可獨立扭轉；應進一步追求「工作——生活正義」，男性與女性都該分擔照顧責任。女性當前在就業市場上立足點不平等，被要求去性別化的同質表現，都是社會不正義。

過去研究總把經濟危機視為性別中立，對兩性的衝擊是相等的，實則不然。以這次新冠疫情為例，女性明顯較男性承受更大衝擊 (Alon et al., 2020)。學者們呼籲，針對每逢危機性別落差，即明顯惡化的現象，政府應有適當介入與政策引導，例如可以順勢鼓勵推動男性負起照顧責任、企業在疫情之後依然維持彈性工時與工作場所的作法 (同上引)。簡言之，新冠疫情不僅是公共衛生議題，更是經濟與社會危機，需要從性別角度檢視結構面失衡在危機中擴大的情形，並思考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 三、亟需具性別觀點的疫情紓困政策

如上所述，疫情帶來的衝擊並非性別中立，女性負擔更大的壓力與重擔。政府可以為女性做什麼？

歐盟報告 (Blaskó et al., 2020)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正加大歐洲

的性別差距，然而全球對應新冠肺炎的政策制定，缺乏性別的角度，也欠缺性別平衡的思維，恐使情況加劇。全球七成以上的醫療照顧人員為女性，但只有 25% 的領袖是女性。決策權力不平衡導致女性的需求無法被列入考慮，例如在制定紓困政策時，極少從女性的角度來規劃。

在疫情發生後，各國政府推出紓困與失業補助，但原本就從事無薪照顧工作、未在就業市場之列的女性，無法領失業津貼或無薪假補助。許多研究批評，各國政府針對疫情所推出的刺激景氣措施，多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思考，並未考慮到女性的需求，例如並未提供收費可負擔的托兒服務，致女性難安心就業。學校關閉、托育服務停止，照顧幼兒的責任落在女性身上；即使有意願復工，這些女性也難以回到就業市場。疫情對於性別平等帶來重大衝擊，種種對女性不利的情勢將延續下去，即使疫情過了也不會立即結束（Alon et al., 2020; Craig, 2020; Power, 2020）。

文化是政策制定的基礎，也影響了政策的施為與運用。Bariola & Collins（2021）比較丹麥、德國、美國政府針對新冠疫情的因應政策，他們運用文化基礎設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s, Norton, 2014）的概念，解釋各國的疫情福利政策因應乃受到其文化框架所影響，亦即如何認定國家－市場－家庭的關係，政府即以此決定其施為。丹麥作為北歐社會民主國家（social democratic state）代表，讓員工居家不上班且由政府補貼九成薪資，避免了大規模裁員，而全國大封城期間，四年級以下兒童依然可到校上課，如此讓父母（尤其是母親們）可快速回到工作崗位，防止性別落差惡化（Bariola & Collins, 2021）。德國被視為保守或統合主義（conservative or corporatist states），長久以來推崇男性養家（man breadwinner）、女性顧家（woman caregiver）模式，封城期間，職業父母可領到政府給付六成薪資，但托育方面，德國年幼兒童多半在家由母親照顧（同上引）。Altintas & Sullivan（2016）估計，德國女性較男性每天多做家事 100 分鐘，疫情使落差更嚴重。美國則是自由主義國家（liberal states），其文化框架推崇個人責任，因此很難將照顧轉化為公共議題，自由市場原則讓美國人只能依照自己能力度過難關，因此既有的性別、階級、種族的不平等也在危機中放大（Bariola & Collins, 2021）。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女性對於健康照顧方面的無償貢獻可達全

球生產毛額的 2.35%，合計約 1.5 兆美元，若估算所有女性貢獻的照顧工作，其產值將達 11 兆美元（Diallo, Qayum, & Staab, 2020）。避免疫情對女性的衝擊擴大性別不平等，聯合國婦女署（United Nations, 2020）提出政策建言，呼籲各國政府須正視在疫情決策中的聲音，重視照顧經濟，包括有給及無給的勞務，關心女性在疫情中所遭受的社會經濟衝擊。報告指出，性別不平等是存在已久的問題，但疫情可能使程度更加惡化；由女性負擔重任的照顧體系，也在疫情中承受沉重壓力（同上引）。

聯合國婦女署（United Nations, 2020）建議，長期而言，政府應致力於創造強韌有力具性別意識的照顧體系，以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出如何提升照顧工作的「5R 計畫」為目標，致力於推廣「使照顧工作轉型為體面工作」，扭轉照顧是低技能、低薪的形象，即承認、減少、並重分配（recognizing, reducing and redistributing）婦女身上的照顧重擔，建立有償照顧工作者的獎酬機制（reward），當政策制訂時優先評估照顧者與受顧者的境況，也就是確保其意見的再現（representation, Addati, Cattaneo, Esquivel, & Valarino, 2018）。「5R 計畫」一重要環節是透過教育提高性別意識，媒體可減少性別職業的刻板印象。例如，全球父職推動組織 MenCare 致力於鼓勵男性主動參與親職與家庭事務，倡議媒體應多呈現男人擔起照顧責任的角色，傳播父親角色的正面形象。政府也可藉著父親享有育嬰假、彈性工時等措施，引導父親分擔照顧責任，扭轉只有女性應照顧家庭的刻板印象，進而提升在家庭與職場的兩性平權，也能增進女性參與勞動市場。

要改變疫情加重的性別不平等，國家與政策制訂者除了短期的救急紓困，長期更應致力推動制度與文化的改變。如何在媒體強化照顧工作者的意見之呈現，使女性聲音不被忽視，藉此增進社會對話，督促政府回應，也是傳播研究可切入之處。

#### 四、女性主義與資本主義裡的媒體政治

許多社運推動者期望借重大眾媒體的力量，獲取公眾注意力，以期能爭取資源，進一步形塑社會主流論述（making the news, Andrews & Caren, 2020）。媒體研究先驅 McCombs & Shaw（1972）提出議題設定理論，認為報紙引領讀者大眾認識重要議題，爾後眾多研究也肯



同新聞媒體具有形塑公共論述以及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例如媒體框架理論、涵化理論等。另一方面，媒體也是社會內的機構，新聞報導受到組織文化、社會既有權力結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關注於媒體再現的論述受到哪些力量的影響，及背後的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Baran & Davis, 2012）。

1991 年 Susan Faludi 在其出版的知名著作《反挫》（*Backlash*）中，抨擊 1980 年代媒體持續描繪負面女性形象、阻礙婦女運動。職業婦女被呈現為壓力過大，一方面雇主降低僱用意願，另一方面也營造女性難以兼顧事業與家庭的氛圍，進而自主回歸家庭、「選擇退出（opt-out）」勞動市場。Motro & Vanneman（2015）分析 1981-2009 年間《紐約時報》共 859 篇報導。有關職場媽媽困境的新聞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明顯增加，直到 21 世紀依然如此，他們認為這與美國性別革命進展受挫有關，政策未著重於提高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誘因，媒體強調職場媽媽壓力與焦慮，也增強女性離職的意願。媒體與政策相互強化，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

相關研究亦可見於 Kuperberg & Stone（2008），他們分析 1988 至 2003 年間美國新聞媒體對女性選擇退出職場的報導，發現儘管女性扮演多重角色，是太太、勞工、亦是個人，媒體卻傾向側重其母職身份，以孩子為中心，所描繪的多是白人中上階層異性戀家庭的精英階層，宣揚「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而大眾媒體持續輸出此形象，連帶影響雇主、男性的預期，更加強化女性應離職回歸家庭印象。密集母職的概念最早由 Hays（1998）提出，母親被建構為主要的照顧者，永遠以孩子優先，遵循專家的建議養育子女，全心投入精神、體力與金錢的教養模式。而這種形象逐漸成為美國社會主流價值，並居道德上風。Brown（2014）指出，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完美超級媽媽經常提醒一般婦女：她們做得不夠好。例如，一位受訪者說：

媒體上的媽媽們總是永遠在孩子身邊、適時提出忠告。她們好美且從不心慌，她們從不穿髒褲或破衣。她們身材好，她們擁有一切。不管是金錢或是外表，她們無一所缺（p. 30）。

媒體確實影響一般民眾想法。McRobbie（2009）亦批評，後女性

主義論述影響大眾文化，從女性雜誌、流行美妝產業，到以女性為對象的電影、電視節目，呈現回歸家庭的新傳統主義形象，卻避而不談這類能選擇「回歸家庭」的女性通常擁有更高學歷、經濟資源與家人支持，這是貧窮女性所缺乏的機會，因此有關性別的選擇同時也是階級議題。而許多媒體上呈現的女性形象，常與消費行為、物質文化合流，鼓吹從購買得到快樂與自主，這也是性別意識被新資本主義收編的現象。Orgad & De Benedictis (2015) 以內容分析法探討 2008-2012 年間英國經濟危機期間新聞對於專職媽媽 (stay-at-home mothers) 的報導，發現新聞常將放棄工作成為全職媽媽建構為個人選擇。實際上 2008 年金融風暴之後，英國經濟大受影響，就業機會亦減少；另一方面，為了服膺歐盟財政紀律要求，政府擲節社會福利支出。新聞報導對於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已婚女性的回歸家庭予以正面評價，卻抨擊勞工階層婦女不參與勞動市場，依靠社會福利，將拖垮財政。

這些研究顯示，媒體報導與政府政策經常是相互影響乃至強化，引領建構了主流論述，並形塑了讀者大眾的印象與自我認同。由於女性長期位於社會弱勢地位，媒體報導經常忽略其意見。因而，儘管新冠肺炎重挫女性的現象已獲眾多研究成果認可，但在媒體報導或政策層面並未受到重視。全球媒體監督報告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GMMP) 每五年進行一次調查，2020 年度有來自 116 國媒體監督社團參與。在其所蒐集的 30,172 則新聞樣本中，僅 27% 訪問女性或主題與女性有關。儘管女性公衛專家人數逼近男性，但女性專家受訪比例僅佔 24%，多數新聞中的女性仍以受暴者形象出現 (GMMP, 2020)。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Wallace & Goodyear-Grant (2020) 分析加拿大的平面新聞報導，當論及疫情中兒童照顧、健康與醫療等議題時，依然缺乏女性觀點。Priola & Pecis (2020) 也指出，在義大利的社會政治體制下，女性意見長期被邊緣化，疫情期間也持續消音。McLaren, Wong, Nguyen, & Mahamadachchi (2020) 在 2020 年 2 至 4 月間，蒐集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越南與澳洲的新聞報導，分析媒體如何再現並詮釋疫情下女性的多重角色與工作。作者們指出，在這幾個國家的報導中，都沒看到政府針對性別平等議題所做的努力，這顯示政策制定者對於疫情衝擊女性的了解不夠，例如：斯里蘭卡婦女在交通中斷下，必須往返於工作與家庭並肩負照顧家中長者與幼童的責

任；馬來西亞封城時，限制家中可外出的代表，當婦女外出為家人採買食物時卻被質疑違反規定；越南女性的聲音難在媒體浮現（同上引）。

由蓋茲基金會贊助的研究報告（Kassova, 2020），蒐集印度、肯亞、奈及利亞、南非、英國與美國等國之 11,913 家新聞媒體在 2020 年 3-4 月間的共 190 萬則報導，以內容是否引用女性專家、以女性行動者為主角的故事、以及探討性別平等議題等三條件檢視女性聲音是否被媒體傳達，並利用多重研究方法分析其內容。Kassova 研究發現，所蒐集的媒體報導有明顯偏誤，缺乏女性政治意見，以致在決策過程中忽略女性的需求。數量上，以男性視角為中心的報導是女性角度的五倍之多。在新聞中的女性經常以尋常人或受害者身分出現，極少是專家表達意見。女性的聲音在疫情報導中消失，是女性意見長久以來在政治領域被結構性地邊緣化的結果，而此波疫情更加重此現象。

## 五、臺灣疫情與女性境況

前述文獻整理出多國學者研究，疫情加重性別落差，女性受創嚴重，卻多未能受惠於紓困措施。2020 年疫情爆發以來，雖然我國整體失業率並未大幅飆高，但若女性因為照顧家庭暫時不找工作，就不會列在失業人口。因失業率統計是指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無工作、隨時可工作、想找工作而找不到工作者」，若非正在找工作者即不在統計之列。2020 年下半年數據顯示景氣好轉，實則忽略行業別的差異，例如全球貨幣寬鬆下導致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脫鉤的「K 型復甦」（中央銀行，2020 年 9 月 17 日），航空、旅遊、餐飲、百貨等依然嚴重受創（陳美君，2020 年 9 月 21 日）。根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蔡思培，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0 年截至 11 月止，「通報大量解僱的行業中最多的是批發零售業，達 27 家、計畫解雇 1,089 人；第二多為住宿及餐飲業 26 家、576 人；第三多是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8 家、458 人」，而這些都是女性就業人數為多的行業。

2020 年第三季經濟表現反彈，較第二季成長 16.59%（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 年 11 月 27 日）。失業率持平、股市熱絡、出口獨旺，這些消息掩蓋了經濟復甦的不平衡，關於女性在疫情中遭受重擊的現象，並未受到關注。事實上，與國外就業情況相似，國內批發零售

業、住宿餐飲業、醫療保健業等，女性從業人數都比男性高（見表 1）。前兩者是因經濟活動、國際旅客歸零受到重創，無薪假人數仍高，醫療保健業則是站在與疫情對抗的最前線，工作風險與身心壓力高。也因此，基層單位與社福團體仍持續接獲求助者。

表 1：2019-2020 年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醫療保健及社工業  
就業人數統計

單位：千人

行業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醫療保健及 社會工作服務業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男性	919	913	400	404	97	98
女性	996	986	448	450	364	376

註：就業者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以上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2021 年 5 月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教育部在 5 月 19 日要求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請所有學生停止到校改以網路學習「停課不停學」。只有家長確實無法照顧子女或無設備者，才可送至學校由輪值教師輔導。由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補習班等各類教育機構亦同時配合停課，需要照顧子女的家長雖可請防疫照顧假，但將失去收入；部份可選擇在家工作者，難以同時兼顧工作與照顧責任。此這階段，臺灣婦女也遭逢如國外封城的困境，照顧資源難以獲得的情況下，只能暫時退出勞動市場。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 年 7 月 22 日）統計，2021 年 5 月份失業率彈升至 4.11%，6 月續攀至 4.8%，6 月失業人口較 4 月份統計增加 13 萬 5 千人，其中女性失業者在兩個月內增加逾 36%，遠高於男性的 27%；4 至 6 月間，就業者人數減少 22 萬 3 千人，其中因經濟因素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者大增 70 萬人。同年 7 月，勞動部公佈的無薪假通報家數續創歷史新高，其中以住宿及餐飲業受創最深（邱琮皓，2021 年 7 月 9 日）。女性除了需負擔主要照顧責任，以女性從業人員為主的行業受到重擊，也使女性比男性更易處於經濟劣勢。

實際上，臺灣就業市場長久存在性別不平等現象。學者許碧純與

邱皓政（2015）的研究運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2000至2011年的追蹤調查資料，發現臺灣女性工作者的薪資變動軌跡，有顯著的母職薪資懲罰現象，女性個人育有子女數越多，薪資越低，平均降幅為1.5%。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105年》顯示，15歲至64歲以上有偶（含同居）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為3.81小時，其丈夫或同居人僅1.13小時，女性比男性多出160分鐘；照顧責任明顯影響女性的就業機會，15-64歲女性在調查當時有工作者佔53.09%、無工作者佔42.76%，無工作女性中29.11%及18.26%分別因結婚與懷孕而離職，就一直未曾再就業。

調查也顯示，15-64歲未在學也未準備生育的無工作女性，未來三個月內不願就業的最主要原因以「家庭照顧（含照顧子女、老人、其他家人、做家事）」為最主要因素（44.22%），因「家庭經濟尚可」的佔37.0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從這些調查結果可知，臺灣社會的情況與前述理論描述接近，家庭性別分工將照顧責任歸於女性，也將女性的「生產工作」視為家庭第二份收入，許多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因而被剝奪。像疫情這樣的緊急危機來臨時，母親也比父親更快放棄就業機會。

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若忽略社會文化背景，欠缺性別意識，很容易擴大性別落差。例如，一般認為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是性別中立，但其實不然。事實上，從行動交通、垃圾處理到食物相關政策的制訂上，向來都很少考慮到性別差異，例如照顧家人的主婦須多點往返接送孩子與長輩，與上班族男性早上出門、傍晚回家的模式截然不同，但公共交通服務缺乏這類服務，以致女性必須依賴自購機車或汽車來支應生活中的行動需求（Reisch, 2001; Vinz, 2009; Wang, 2016）。這些政策將日常慣例行為道德化，增加了家事的負擔，且重擔不成比例的落在私人家戶，尤其女性成員的身上，造成女性的環保壓力（eco-stress），這是「將環境責任私有化且女性化」（Schultz, 1993）。同樣的，在肺炎疫情中，許多防疫政策令家庭中的女性必須一肩扛起所有責任，也是把防疫責任「私有化且女性化」。

綜前所述，不僅國際學界關注到疫情中的性別落差現象，臺灣女性也因為疫情使既存的不平等現象加重。從傳播研究的立場，需關注臺灣新聞媒體能否注意到此現象，進一步推動政策倡議，並引導文化改變，透過長期且持續地關注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促進女性處

境的改善。

## 參、研究架構與方法

針對疫情導致女權運動成果大幅倒退，學界雖注意到此國際現象（吳商平，2020；吳嘉苓，2020），但有關臺灣女性的境況，尚待更多研究投入。相較於世界各國，臺灣的防疫成果相對出色，多數時候可如常行動，但三級警戒起亦經歷經濟衝擊，停課、停止託育可能使得作為照顧者的母親承受高壓，並身陷困境。

探討性別與媒體議題亦需考慮政治、經濟、階級、族群等因素，Walby（2007, 2009, 2011）有感於全球化理論經常關注資本、國家、階級等議題，忽略性別與其他類別的不平等；然而，光是討論階級並無法妥善處理性別落差，由其他主題切入亦會有類似困境，因此，她主張以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的視角來探討相關現象。複雜理論認為社會上同時存在多重系統：一類是機構化的領域如經濟、政策、暴力、和公民社會，另一則是社會關係，如階級、性別、種族等。單一系統時可將其他系統視為環境，例如：階級、國籍、種族等面向的不平等為性別不平等的環境（Walb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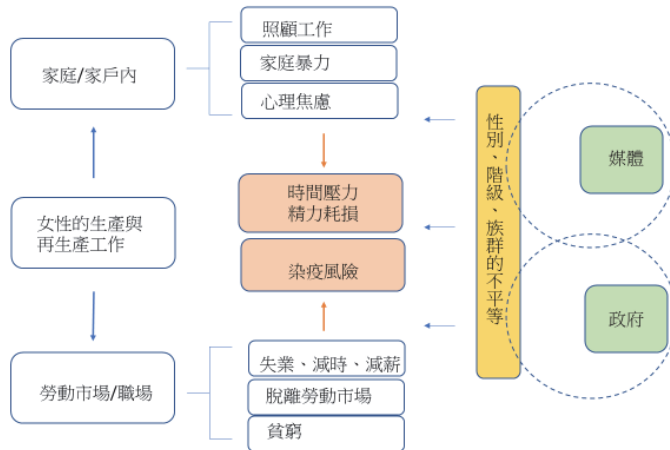
Walby（2011）認為，複雜理論中的「交會（intersection）」概念多重系統彼此有自行運作的邏輯，但彼此也有交會之處，有助於探討多重不平等現象，擺脫單一視角的限制，並帶來創新思維。Walby也指出，複雜理論重視系統間的共同調適與演化，系統之間有相互反饋機制，因此小改變可能產生失衡引發災難，但也可能有正面回饋最終促進改變，因此推動改革是有可能的（相關討論亦可見 Walby, Armstrong, & Strid, 2012）。

疫情下的婦女處境正需要從多系統的架構來理解，兩性薪資落差以及疫情危機中更易被裁員的脆危現象，就與母職實踐、家庭性別分工、就業環境、照顧體系、及政府政策都有關係。Stevano, Mezzadri, Lombardozi, & Bargawi（2021）認為，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造成公共衛生與經濟的雙重危機，除了重擊原本就脆弱的家戶性別結構及底層勞動市場，更進一步強化了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不平等。封城等居家限制禁令，將家戶推上政府防疫政策的前線，也再度成為社會行動與社會福利體系的核心。原本應由國家分攤的照顧責任再度私有化並且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肩上，女性需承受家戶內分工不均，在勞動市場

則面對脆危職業的本質。新自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當代，家戶已承受許多不公平的重擔，如今疫情使各種面向的落差再拉大。

這些研究呼應了，性別落差從不單純是性別議題，不僅涉及經濟、政治、階級，媒體報導與政府政策也參與其中。媒體是社會中重要系統，並與各個系統緊密交織，實際上也是意見與權力交會的節點，具有顯著影響力。國際組織積極呼籲媒體減少性別刻板印象，讓照顧工作成為體面工作，鼓勵男性參與；另一方面，媒體可反映女性處於劣勢地位面臨的實際問題，倡議運動，並督促政府推動相關措施與改革。如果研究能夠提醒媒體工作者更有反思性，對於女性權益更加重視，在相關政策制訂時賦予女性更多發言權，媒體未必如同政治經濟學者所批判——只能反映既有權力結構與意識型態，我們仍可期待媒體促進社會改變。因此，本研究參考 Stevano et al. (2021) 之概念，並提出研究架構並提出圖 1 之研究架構。

圖 1：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處境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1 依場域說明疫情下女性的生產與再生產工作。在私領域家庭／家戶內的照顧工作使得女性面臨多重壓力，花費時間體力且有承受家暴風險。在公領域就業市場則有可能被裁員、減薪，退出勞動市場，將導致經濟收入匱乏，若持續工作則有染疫風險。這些處境使得女性比男性受創更重，性別不平等又與階級、族群等因素交會，例如

勞工階級較白領更難選擇居家上班，尤其是餐飲零售、旅遊服務、醫療照顧等女性受雇人數居多的業別，而單親、婚姻新移民承受更大經濟與照顧壓力。媒體系統具自主運作邏輯，亦與既有不平等現象、政府組織都有交會，並與其他系統共同演化。因此，新聞媒體能觸及前述的多重不平等，雖然報導時受到既有的意識型態影響，但也有機會成為促進改變的起點。

綜合以上，本研究欲從複雜理論視角切入，探討臺灣新聞媒體與其他不平等現象的交會，並以報紙為例，分析其是否注意到疫情加重的性別及多重不平等現象？以及如何呈現之？期待本研究有助於媒體更積極扮演驅動社會改變的角色。

在臺灣媒體生態中，報紙雖然發行量逐漸萎縮，但仍是新聞媒體的意見領袖，且報紙代表傳統新聞業的專業分工與專業價值邏輯，故本研究選擇報紙作為臺灣主流媒體代表。根據2021年競業信息〈2021年第二季【潤利艾克曼公司】媒體大調查報告〉，臺灣北部地區民眾七天內閱報率前四名依序為《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及《中國時報》。然而《蘋果日報》自2021年5月18日宣布停刊，《蘋果新聞網》雖繼續運作，但已無紙本發行。為比較之便利，選擇《自由時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為樣本。

相較於報紙往往經營多時，在各國媒體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新興網路媒體較易成為小眾焦點。Yun, Postelnicu, Ramoutar, & Kaid (2007) 蒐集美國、英國、南韓、墨西哥等國線上雜誌內容，發現女性主題僅佔整體報導的3%-5%，不過當內容提及女性時，其形象較傳統媒體多元，且重要性與男性相當，因此認為網路媒體可能更有潛力呈現多元且性別平等的媒體報導。GMMP (2020) 也指出，相較於傳統新聞媒體，網路新聞的性別刻板現象較不明顯。臺灣純網路新聞媒體多以小規模運作，取材區隔傳統媒體，除了捨去版面的劃分，也以議題導向吸引年輕讀者。因此，本文也選擇網路新聞媒體對照報紙，了解兩者在報導數量與角度上是否有明顯差異。

依照《創市際雙週刊》調查（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21），以單月不重複訪客排序，「獨立網路媒體」數位使用人數依序為《周刊王》、《風傳媒》、《新頭殼》、《鏡週刊》與《關鍵評論網》。由於《周刊王》大量轉載《中國時報》，且《鏡週刊》的主要媒體為雜誌，故本研究選取《風傳媒》、《新頭殼》與《關鍵評論網》為網路



新聞媒體樣本。

文本蒐集方法為運用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資料庫，搜尋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刊登於上述六家媒體的報導。搜尋標題或首段包含「疫情」（含同義詞「肺炎」）的文章，分別得到《聯合報》15,806 篇、《中國時報》16,142 篇、《自由時報》6,210 篇。若搜尋同時包含「疫情」（含同義詞「肺炎」）及「媽媽」（含同義詞「女性」、「母親」、「婦女」）關鍵詞的文章，分別得到 394、391 及 88 篇文章，由研究者篩選與主題相關性，得出《聯合報》16 篇、《中國時報》15 篇及《自由時報》12 篇。獨立網路媒體方面，《風傳媒》、《新頭殼》與《關鍵評論網》標題或首段包含「疫情」（含同義詞「肺炎」）的文章各為 11,042、19,493 及 1,444 篇，同時包含「疫情」（含同義詞「肺炎」）及「媽媽」（含同義詞「女性」、「母親」、「婦女」），各有 150、175、29 篇，經逐一檢視相關性後，分別蒐集 20、11 及 5 篇報導（見表 2）。

表 2：本研究收集的相關報導

媒體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首段包含「疫情」（同義詞：肺炎）	15,806	16,142	6210
首段包含「疫情」（同義詞：肺炎）與「媽媽」（同義詞：女性、婦女、母親）	394	391	88 (659)
立意篩選與主題相關文章	16	15	12
媒體	風傳媒	新頭殼	關鍵評論網
首段包含「疫情」（同義詞：肺炎）	11,042	19,493	1,444
首段包含「疫情」（同義詞：肺炎）與「媽媽」（同義詞：女性、婦女、母親）	150	175	29
立意篩選與主題相關文章	20	11	5

註：(1)報導期間為 2020 年 01 月 01 日 - 2021 年 07 月 31 日。(2)《自由時報》圖說被視為第一段，因此首段包含關鍵詞的篇數明顯較少，內文有包含關鍵詞的報導篇數為 19,818。若選「同一段」包含關鍵詞的報導則有 659 篇，之後逐一篩選，與研究主題相關者 12 篇。

本研究先將報紙新聞分類，將報導之發表日期、報紙版面、文章類型、引用消息來源、女性角色之代稱、所涉及實踐、使用的形容詞進行編碼，再利用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方法來解構新聞文本。批判論述分析是一套跨領域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雖然研究者有不同的關注焦點和鑽研角度，但對於論述、批判、權力和意識型態有共同的興趣（Wodak & Meyer, 2009）。批判論述分析將語言視為一種社會實踐（Fairclough, 1995），不僅重視論述本身，更重視論述所發生的情境。一方面，背景、機構與社會都影響了論述，另一方面，論述也影響了其他行動。換言之，論述體現了語言與其他社會實踐互動的過程（Wodak, 2001）。因此「批判論述分析並非只關心語言，而是以跨領域與多重分法來探討社會現象」（Wodak & Meyer, 2009, p. 2）。

Wodak（2001）所提倡的歷史論述方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強調，不僅要挖掘文本的情境，也要察知所隱匿的、被忽略的，發言者的論述策略如何運用語言技巧，藉由使用主詞、代名詞、形容詞、動詞、象徵修辭、主動與被動語等來達成。亦即，論述建構了行動者與被動者，區別了我群與他者，並藉由修辭譬喻來連結社會中默認的隱喻及價值判斷，透露出言外之意，包含其潛藏的意識型態。論述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與其他文本具有共時與歷時的關聯；論述也是跨主題的（interdiscursive），例如性別、種族等主題可能都涉及對弱勢的關懷。Wodak 提出分析論述策略的五個關鍵問題（同上引，pp. 72-73；另詳見王雅玄，2005；Reisigl & Wodak, 2000, pp. 44-46）：

- （1）指稱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個人如何被稱呼？
- （2）預測策略（predicational strategies）：連結到哪些性狀、特徵、品質和特點？
- （3）立論策略（argumentation strategies）：個人與團體使用什麼策略將排除、歧視、壓抑與剝削他者的行為正當化？
- （4）觀點與框架策略（perspectivation and framing strategies）：這些命名、指稱或表述是從哪個立場發出？
- （5）緩和與強化策略（mitig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strategies）：用了哪些策略來強化或淡化論述？

本研究關注疫情對女性的影響，將解析報紙如何詮釋疫情及其對

女性的影響，架構並解釋性別分工的概念。本文將檢視，新聞文本中女性如何被指稱？女性的角色與形象如何被敘述提及，以及疫情所造成的性別落差是否被注意到？如何被討論？連結到的現象與措施有哪些？用了哪些詞語來強化效應或淡化問題？並探討哪些報導角度被強化呈現、透露出何種意識型態及權力關係，又有哪些角度被忽略？

## 肆、報紙媒體文本分析

一年七個月期間，三家日報關於疫情的報導量各自在一萬五千至兩萬篇之間，但排除母親節消費行銷類報導，以及影劇新聞之後，逐一閱讀各篇標題與內文，篩選關於疫情中的女性照顧責任及處境的文章，數量比例僅千分之一。

從三家報紙蒐集的 43 篇報導中，16 篇刊登於報紙第一落要聞版，其餘來自地方版（11）、民意論壇（7）、家庭副刊（7）、國際版（2）。在初期，與女性相關的報導主題多與疫情初現、搶購口罩的熱潮有關，2020 年 2 月刊出 9 篇報導，多描述「婆婆媽媽」為「瘋狂搶購者」，代替家人排隊，或是親手製造布口罩。2020 年 4 月的 5 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是外電新聞論及女性領導人的防疫表現，其餘 4 篇報導注意到婦女遭受家暴的現象。在 2020 年 5 月至隔年 4 月，為期一年間共 16 篇，多為外電報導，例如婦女節的應景新聞，或地方社團團體援助弱勢女性之新聞。2021 年 5 月發現本土病例急增，疫情升至三級警戒，相關報導再度增多，2021 年 5 至 7 月共 10 篇，內容多為副刊或論壇之投書，探討婦女受暴、承受壓力的現象。以下段落解析在這些報導中的論述策略，包括女性如何被指涉、描述，呈現何種觀點策略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

### 一、口罩與婆婆媽媽

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自 2019 年底從中國武漢擴散開來，中國官方採取強硬的封城管制，限制居民外出。臺灣疫情在 2020 年接近農曆春節假期時爆發，一時之間口罩短缺，民眾擔心確診被隔離，或採取類似中國的封城措施，出現搶購物資現象。新聞媒體報導常將這群消費者常被標籤為「婆婆媽媽」，例如：

武漢肺炎疫情讓不少民眾精神緊繃，除了瘋搶口罩、乾洗手，近日還有不少人因親友團群組或婆婆媽媽間瘋傳衛生紙、紙尿褲、尿布、衛生棉等，可能是下批缺貨或漲價的項目。（陳立儀、何雅玲、陳雨鑫，《聯合報》要聞 A4，2020年2月8日）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臺口罩供不應求，許多民眾抱怨搶不到口罩，臺東市民代表陳金溪熱心提供 600 片口罩發送，婆婆媽媽拄著助行器、騎著電動輔助車全都趕來排隊領取。（楊漢聲，《中國時報》高屏澎東新聞 A11K，2020年2月2日）

婆婆、媽媽是社會關係中的女性，中文成語中原就有偏向負面的詮釋，例如《教育部國語辭典》引用《紅樓夢》及《官場現形記》解釋「婆婆媽媽」一詞「形容一個人拿不起，放不下，做事不乾脆」。此處的報導中，婆婆媽媽相信網路流言，恐慌性搶購民生用品與防疫物資，有免費口罩即願意不辭辛苦前往排隊領取。這群女性被形容為非理性的消費者「瘋狂搶購」，或者因為不用上班、時間充裕，為了小惠而不辭辛勞排隊。在報導中引述超市量販業者出面呼籲資源充足請勿搶購，把醫療物資留給第一線的醫療人員，並由政治人物來安撫人心，呼籲民眾勿搶購口罩。

在疫情初期口罩生產不及，政府採取口罩限購政策，此措施也衍生另一類報導，即因應學校要求學生上學須戴口罩，媽媽們急著為小孩採買醫療口罩。例如「不少幼兒園硬性規定學生須戴口罩，媽媽們哀號，買不到小孩子用的醫療口罩」（黃佩君，《自由時報》A02，2020年2月1日）、「口罩難買，急壞一堆爸爸媽媽。家長群組瘋狂詢問哪裡有口罩可掃貨」（吳亮賢、袁庭堯、吳建輝，《中國時報》A3，2020年2月1日）。這些新聞報導將口罩搶買視為熱門現象，文中的媽媽們為了小孩搶不到口罩而心生焦慮，受訪政府官員則評論「目前國內對口罩需求很多是『恐慌性需求』（黃佩君，《自由時報》A02，2020年2月1日）。

恐慌搶購的婆婆媽媽被塑造為非理性消費者，甚至遭到社群媒體訕笑，被視作自私囤貨不顧公眾需求——「大媽：你 OK、我先領口

罩」(平雨晨, 2021)。實際上, 這些婆婆媽媽們是為誰買口罩、搶物資呢? 平雨晨實際參與排隊購買口罩的經驗發現, 這些排隊買口罩的婦女們掛念的是家人上班沒時間買、親人出門沒口罩戴、口罩不夠用等, 在限購政策下不辭辛苦排隊, 累積一定數量後寄給在遠方都市或是旅居國外的子女。媽媽們在前述新聞中被呈現恐慌、非理性的消費者, 但從一篇讀者投書可看出, 少了母親排隊搶購口罩, 子女才了解口罩短缺的嚴重性, 進而究責政府令人民無法安心。

春節假期中, 因為母親住院, 無暇排隊搶購口罩, 才發現「一罩難求」的問題有多麼嚴重。(施志勝, 《聯合報》民意論壇 A13, 2020 年 2 月 5 日)

同時, 婆婆媽媽也是主動尋求替代方案, 以及社區動員的主要支持者。口罩缺乏時, 社區媽媽動員趕製口罩套, 「一名媽媽負責縫紉, 其他十人幫忙裁布、畫線、摺布」(張朝欣, 《中國時報》雲嘉南新聞 A13, 2020 年 2 月 18 日), 以生產線方式每小時產 60 個口罩。因口罩不足, 民眾訂製口罩套或布口罩代用, 「醫療口罩一片難求, 婆婆媽媽轉而跑到布市買布製作口罩套和布口罩」(楊心蕙、陳璟民, 《自由時報》北市新聞 A12, 2021 年 2 月 27 日), 媽媽們看影片學做口罩套, 湧入臺北市迪化街上的永樂市場買布。在這些報導中, 製作口罩套的媽媽們只稱「陳太太」、「劉姓婦人」, 唯有商場會長、醫生被具名引用來說明市場業績, 並認可口罩套能延長醫療口罩使用時間。這呼應了 Moser (1993) 提及, 女性擔任社群管理工作經常是無償奉獻的志工, 而男性則經常擔任社群組織的管理職位。

如同投書所言, 因母親住院無暇排隊領口罩, 作者才感知口罩荒的問題嚴重; 積極投入解決問題的女性們, 參與社區工作, 付出無名、純真且無私的貢獻。疫情中的媽媽代親人排隊買口罩、搶購物資、製作口罩套等, 正是母職的實踐。這類實踐呈現母職即照顧者的框架。關於母親的刻板印象包括: 長久居家忽略公共議題、跟不上社會潮流、未加入勞動市場因而時間成本低、盡責照顧家人且樂意奉獻等。婆婆媽媽的標籤反映女性長期負擔再生產工作, 維持並照顧勞動力, 卻不受重視甚至遭輕蔑對待。這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衝突: 一方面歌頌母職神聖偉大, 一方面又貶低照顧者的付出 (Hays, 1998)。

## 二、無聲的受暴婦女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年10月4日）國情統計通報，2020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被害人計11.4萬人，較上年度增10.1%，其中女性增加6.7%占65.7%，較男性高31.4個百分點。除了12歲以下男童受暴比例較女童略高，12歲以上各年齡層統計，受暴被害人都以女性居多，尤其24歲至未滿50歲各年齡組，女性被害占比超過七成。儘管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家暴案件大增，但檢視所蒐集的報紙文本，僅9則與家暴主題相關，且非犯罪相關報導，而是由社福團體發動、地方政府社會局為消息來源或翻譯外電，例如：

疫情讓社福團體擔憂家暴潮，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范國勇表示，臺灣疫情雖沒有歐美國家嚴峻，但無薪假人數暴增，不少家庭面臨生計困頓，緊張、焦慮感難免提高，容易產生摩擦，呼籲政府紓困要及時到位，至少先把危急家庭從「經濟洪水區」撤離。（連線報導，《聯合報》話題A5版，2020年4月19日）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也對於社會造成影響，據新北市社會局統計，3月家庭暴力通報案件較去年同期增加29.2%，另外兒少性剝削也增加130.77%，婦女、兒少、弱勢族群面臨更嚴峻考驗。（戴上容，《中國時報》新北市金馬新聞A13，2020年4月11日）

2020年4月份的相關報導以受暴婦女為主，往後月份也持續出現類似題材新聞。例如2020年11月，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范國勇再度發聲：「雖然臺灣沒有因為實施如封城等強硬措施，但因為疫情導致部分行業實施無薪假、失業等，許多婦女向現代婦女基金會求助時表示，多是因為經濟因素」（盧金足、林良齊，《中國時報》話題A6，2020年11月08日）。同一月份，勵馨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發布的新聞指出，「他們所服務的700多名家暴及疏忽照顧個案中，有90名婦女及青年因被迫面臨失業、減班」，急需經濟扶助與就業幫助，「甚至還有懷孕婦女尚須扶養子女，難以負擔養育」（鄭維真，《聯合報》全臺焦點B1，2020年11月28日）。

受害者、演藝名人、重要男性的伴侶或女兒，這三種是最常出現在新聞媒體的女性形象（Ross & Carter, 2011）。家暴是犯罪行為，並且危及生命安全，但新聞媒體對之遠不如其他社會案件重視，男性施暴者常被描述是「有原因的」，例如失業、沮喪；反之若女性成為施暴者，常引來媒體注意，並形容之為蛇蠍女、不道德，且判刑經常較男性更重（Carll, 2003）。Nettleton（2011）分析 1998-2008 年間在美國出版的女性與男性雜誌，發現關於家暴的再現有別：女性被描繪為可預防暴力發生，而男性是無法自主；家暴對女性是可怕，但對男性是有趣；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受暴者應離開施暴者。這些雜誌都沒有問責男性施暴者，例如要求男性應該為暴力負責，採取積極作為以減少家暴，未同理無辜受傷的女性受暴者，也未檢討父權社會結構與家暴存在的關聯。

臺灣報紙新聞提到疫情間的家暴時，女性既是照顧者，也是家暴與失業的受害者，她們「愁眉不展」，感到勞累、挫折，也處在「困頓」、「緊張」、「焦慮」之中。女性被呈現為家暴與失業的受害人，多數是統計數字中的一員，他們沒有主動發言，沒有機會說出自己的處境、經歷或意見。這些報導固然提及女性受害者可堪憐憫，但缺乏將家暴視為犯罪案件的報導，未見媒體問責男性施暴者，或者督促警察機關積極介入，反而是「家庭面臨生計困頓，緊張、焦慮感難免提高，容易產生摩擦」的敘述，為施暴提供了理由。

### 三、婦女身心壓力—作為軟性新聞與自我責任

為防止疫情擴散，2021 年 5 月 19 日起教育部宣布，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失去學校與托育機構的奧援，媽媽們的壓力更加推升。報紙文本中有 3 篇與女性心理健康有關的文章於 2021 年六月間登載於《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副刊。

在〈「疫」期壓力大 女性慎防「新冠失眠」〉一文引述精神科醫師王浩威發言，指出疫情壓力易促使情緒反應激烈，女性多於男性，引發新冠失眠，「成年女性情緒反應較男性來得嚴重，恐慌、緊張、煩躁比例較高」、「除原本情感上就較為敏感，也許現代女性身兼多職有關，承擔工作、家務及照顧孩子等，疫情下自然也受到不少衝擊」（林惠琴，《自由時報》健康醫療 B08，2021 年 6 月 22 日）。另一篇以〈壓力大 居家上班兼顧小孩 專家：先降低標準〉為標

題，從女性上班族居家上班時「小孩在旁邊『媽媽、媽媽』地叫」場景切入，引述心理師公會理事長羅惠群談話，「疫情期間要保持特殊彈性，以前要做到 100 分的事情，現在容許自己做到 80 分就好。」並建議讀者「先降低標準，試著自我調整、自我接納」（蕭羽耘，《聯合報》健康 D4，2021 年 6 月 25 日）。

同一天《自由時報》家庭 PLUS 版刊登「色彩療癒師 Sara」專文〈媽媽 2.0 快樂向前行〉，針對疫情期間感到「心力交瘁」的媽媽們提出五項建議：（1）提升幽默感，開放性思考輕鬆看待生活；（2）提高自我價值感，肯定與嘉許的能力——清楚就不辛苦，甘之如飴快樂付出愛與享受愛；（3）擁抱真實自我，真愛與接納自己——當我們能夠接納自己本來的樣子，也能允許家人做真實的自己；（4）放手信任家人，彼此輕鬆自在——媽媽放鬆自在，爸爸孩子也能輕鬆自在；（5）去做想做的事情，做你想成為的自己、妻子和母親（Sara，《自由時報》家庭 PLUS，2021 年 6 月 25 日）。文章最後以「每一位媽媽都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幸福家庭生活」作結語。

如文獻回顧時提及，女性在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確實值得擔憂（Czymara et al., 2020; Clark et al., 2021; Manzo & Minello, 2020）。上述報紙文章的共同點是刊登於健康或家庭副刊，以婦女為目標讀者。內文默認媽媽身兼多職，以「成年女性情緒反應較大」來解釋女性較易失眠的現象，至於要如何因應壓力？所提供的對策則是要女性反求諸己：「降低標準、自我接納」、「甘之如飴」付出、「放手信任家人」……等等。意味著女性是因為標準太高、無法信任家人、事必躬親才會感到焦慮，如果能調整心境，就能找回自我，活出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這樣的立論策略忽視結構因素，將婦女於社會中的角色及隨之而來的壓力正常化。

現代女性需身兼多職，承擔工作家務及照顧孩子，為何現代男性不用呢？正如 Brown（2014）指出，當代論述將密集母職視為女性個人選擇，卻未審視整體文化環境的壓力。如果男性／爸爸能分擔更多照顧責任，制度面能提供更多支援，都有助於緩解媽媽的焦慮及壓力，有助其心理健康。只要求女性調整個人心境，接納自我角色，卻忽略社會整體壓制女性的不公平，類似論述落入父權主義下「好媽媽、好太太」的框架，要求女性既要盡心盡力，又要心情平和，將女性的貢獻視為理所當然，卻忽略體制面的結構性問題。換言之，這類



文章以女性讀者為對象，看似從女性的立場發聲，其論述卻是呼籲女人要求自己，而非尋求社會改變。

本次研究蒐集到報紙疫情新聞中與女性相關的報導，超過六成出現在次要版面；論及家暴婦女的新聞，僅 2 篇報導出現在要聞版，其餘散見民意論壇、地方新聞以及國際版，而消息來源主要是讀者投書、社福團體等非營利組織以及外電。從版面來檢視，這些新聞或文章被安排在副刊，一方面反映新聞機構對其顯著性的評價不高。另一方面，家庭生活、健康醫療等副刊版面，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讀者感興趣的版面，也反映編輯室判斷，照顧焦慮是女性關心的主題，但不是具新聞性且受到大眾關切的公共議題。

Tuchman (1973) 的新聞學經典研究指出，在組織內經常區分硬新聞與軟新聞，硬新聞是重要資訊，也是新聞競爭的主要戰場，而軟新聞就是人文趣味。硬新聞通常具有時效性、顯著性，必須即時報導，相對而言，軟新聞不具時效性、可以等待。報紙新聞的實踐慣例，重要新聞被安排於第一落刊出，版次越前越顯著，是注意力最高的主要版面，也是同業新聞競爭依據之標的。至於國際、地方、投書、副刊等，版次往後以及第二落以後的版面，被歸以軟性、無時效性的新聞屬性，都屬於次要版面。

Holland (1998) 從歷史角度回顧，1896 年創立的 *Daily Mail* 是第一個以中產階級女性為目標讀者的報紙，以消費導向的內容吸引貴婦族群，販賣「理想家庭」形象，藉由辦理家具用品展示，建構女性為家務管理專家。以消費新聞擴大讀者群策略，種下女性氣質與低公共位階的連結。Allan (1998) 進一步指出，新聞室總假想男性讀者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如經濟、政策、與運動新聞等；而女性讀者僅對個人、私領域、家戶內的資訊感興趣，諸如健康、關係、美容和育兒等。新聞室也將事實價值性別化，硬新聞是公共領域需要訪問專家反覆確認的硬事實，反之，女性日常生活經驗是私領域、微小、依賴直覺且缺乏新聞價值。對於軟硬新聞區分也影響到記者的分線，經常是男記者被分配到硬新聞，而女記者被分配到軟新聞，強化新聞組織內的性別階層關係 (Sjøvaag, 2015; North, 2016)。

#### 四、被忽視的性別正義——女性是永遠的照顧者？

2021 年 5 月起臺灣疫情進入三級警戒，新冠肺炎確診者須被立即

隔離治療，單親媽媽子女無人照顧的問題引發注意，《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都見相關報導。

本報接獲女童親友投訴，萬華區有位小一女童的媽媽日前確診武漢肺炎，送往醫院治療，女童與姑姑隨後也確診，姑姑甚至被送到醫院插管治療，不過，女童卻被獨自留在家中。  
(編輯部，《自由時報》北市都會焦點 A13，2021 年 5 月 19 日)

這類事件也凸顯出照顧責任長期落在母親肩上，當母親生病無法繼續擔任照顧者時，只能依賴私人親友支持網絡，國內現有的社會安全網並不足以支撐兒童照護及安全。對於身負健康、經濟、照顧責任於一身的單親媽媽而言，疫情更使其處境如履薄冰。Stevano et al. (2021) 指出，全球資本主義是建立於對照顧、再生產工作的擠壓與貶低，為因應新冠肺炎擴散而限制人民外出的政策，使得原本已緊繃的性別落差更加嚴重。

女性、經濟弱勢、單親、新移民身份等多重不平等的交疊，使得族群處境脆危，然而只有當事件涉及兒童時，相關新聞才引起注意，反映了社會整體以孩子為中心 (child-centric)，照顧孩子的母親卻容易被忽視。Greaves et al. (2004) 的研究論及，2001 年加拿大發生一歲大嬰兒只穿著尿布與單薄上衣在雪地裡快凍死，被發現後緊急送醫救活的事件。此事件立即成為全國新聞焦點，媒體立刻找到其母親，她兼具單親、原住民、遊民等多重弱勢身份，但相關報導多數聚焦在保護兒童，對於母親如何身陷貧窮，以及制度上如何協助，卻很少提及。

進入三級警戒之後，相關限制措施造成女性 (尤其是媽媽們) 同時面臨經濟與照顧的壓力，但 2021 年 5 至 7 月間疫情相關新聞中，能關懷到女性艱難處境，並從女性角度發言的報導，僅寥寥數篇。基於媒體議題與政策是相互建構的密切關係，性別落差議題在疫情新聞中消音，部分也因相關政策並未從性別角度發聲。自 2020 年起，我國政府因應疫情的紓困方案，第一波推出新臺幣 2,100 億元的紓困預算，如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20 年 5 月 13 日) 發布的新聞稿所述，政院自認「穩就業、護弱勢階段成果良好，臺灣可突破難關」。然

而，從行政院（2020年8月31日）提出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措施中，缺乏針對女性特別需求的作為。例如，若家人需要居家隔離，身為照顧者的女性勞工就無法上班，又有些女性未投入勞動市場而負擔起家中的無償勞動，這些人不能請領失業救濟金，亦無法參與職業訓練。

2021年5月後政府推出的「紓困4.0」，主要採取定額補貼的方式，例如發給家有國小以下孩童、國高中和五專前三年身心障礙學生，每位孩童發一萬元家庭防疫補貼；中低收入戶兒少、弱勢（兒童、老人、身障）的族群每月加發1,500元津貼（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1年6月3日）。然而補助對象是「孩童」，請領的身分是「家長」，紓困資格以「行業」為基準，這些去性別化的詞彙與措施，掩蓋了性別差異。此外，一次性補貼對於緩解照顧責任只是杯水車薪。婦女新知基金會（2021年5月25日，2021年5月28日）指出，若無法安心托育，第一線的工作者也難以安心堅守崗位，呼籲政府應以紓困預算來提供受僱者「防疫照顧假」期間之津貼，並放寬防疫照顧假申請資格，讓有需求者皆可申請。

Greaves et al. (2004) 認為，當關鍵事件出現時，媒體報導是影響公眾論述以及政策走向很重要的一環，若能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思與質問，就有機會引導公共政策，使之能更注意到女性的需要。例如媒體可參考聯合國婦女署建議，政府直接對女性個人與中小企業主紓困，減輕女性經濟壓力，並在健康方面提供女性照顧者充足資訊、財務與資源補助，藉機督促政策制定者注意到疫情衝擊性別平等的現象並有所因應。

## 五、報紙與網路媒體的比較

網路媒體因經營規模與策略差異大，每日產出的新聞則數不一。《新頭殼》與報紙的作法較相近，除了每日新聞事件，亦有專欄、投書等文類，且大量使用外電、中央社等通訊社稿件；《風傳媒》除採用通訊社稿件，亦與《新新聞》、《天下雜誌》、《今週刊》、《日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等多家媒體合作；《關鍵評論網》專注於自家關注的評論特色，如日本、香港、東南亞國際情勢，總則數最少。

基於網路媒體特性與閱讀習慣，其版面與主題設定不明顯，從資

料庫蒐集也難以回溯文章是否曾被放置頭條及醒目提示，因此本研究不著重於比較各家媒體篇數比例或版面差異，僅關注於相關報導的來源及內容論述。三家網路新聞媒體共蒐集到 36 篇有關疫情與性別落差之報導，數量上亦非常稀少，其中 25 篇來自翻譯外電或統整外電相關報導。《關鍵評論網》、《新頭殼》的報導集中於 2020 年初期以及 2021 年五月之後，亦即疫情較緊張時期，《風傳媒》則以每月 1 至 2 則的頻率發布。

因人力較少，且需與傳統主流媒體區隔目標讀者，網路獨立媒體更倚重外電與國際報導，採取議題導向的取材策略，也進行跨媒體策略聯盟，並積極邀請評論與投稿，以豐富網站內容。《新頭殼》引用《路透社》(Reuters)、《中央社》、《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 CNN)、《日經新聞》內容，報導〈女性上街抗議 大男人主義比武漢肺炎害死更多人〉(《新頭殼》，2020 年 3 月 9 日)，以及在日本、義大利、西班牙、美國等地，關於疫情期間婦女遭受失業、家暴的現象。《關鍵評論網》報導馬來西亞政府在 2020 年 3 月間實施行動管制令，限「一家之主」外出採買，眾多自告奮勇的男性卻需在太太遙控指示下，才知道要購買哪些項目。2021 年 6 月刊登學術評論於性別專欄，指陳〈家庭暴力、性別經濟結構、母職過勞，女性面臨疫情下的三重困境〉(平雨晨，《關鍵評論網》，2021 年 6 月 25 日)。

《風傳媒》與《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合作，在疫情期間持續關注性別落差擴大現象，針對女性遭受家暴、經濟剝削、失業率更高、自殺率暴增等現象，平均每個月發布一至二則相關新聞。所篩選的 20 則相關新聞中，13 則的消息來源為外電，部分為整理多則國際媒體與組織發言之綜合報導，例如〈新冠肺炎是全球男性殺手！女性生活卻更受疫情衝擊〉(風傳媒，2020 年 5 月 18 日)，整理自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歐盟觀察者》(EUobserver)、《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報導，並引用德國婦女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聲明，直陳疫情期間國際社會發生性別不平等惡化的種種現象。《風傳媒》2021 年 7 月刊登 2 則自由撰稿人游婉琪的深度報導，探討臺灣職場媽媽在三級警戒中的困境與制度缺失。防疫期間若仰賴長輩照顧子女，除了擔心病毒傳播，亦面臨世代對於性別角色與教養觀念

衝突，雖有防疫照顧假卻擔憂扣薪，身兼多重責任但伴侶不樂意分擔，「爸爸抱著筆電躲到書房開會；媽媽一邊工作一邊張羅三餐，安撫哭鬧的小孩。」（游婉琪，《風傳媒》，2021年7月29日）

整體而言，不管是主流報紙媒體、或是獨立網路媒體，注意到疫情與女性相關議題的新聞稀少。在報導角度上，獨立網路媒體內容大量整理自外電，取材較少性別刻板印象，亦能注意到疫情加重性別不平等現象，並探討制度相關議題。

## 伍、結論與討論：從性別角度報導疫情衝擊

關於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加重性別落差現象，雖已見國際媒體與文獻提及，但有關臺灣本地經驗的研究仍少。本研究首先整理統計與調查資料，發現臺灣女性在疫情中失業率較男性更高，薪資比男性低；且女性負擔多數無償家務勞動，以致阻礙其進入勞動市場，長久居於社會弱勢的處境。在疫情影響最重的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醫療保健業等，臺灣女性從業人數都比男性為高，單親或新移民女性承受階級、性別、族群不平等的交疊，處境更加脆危。

本文繼而針對女性生產與再生產工作所遭遇的挑戰與困境，提出分析架構，欲檢視主流報紙媒體如何呈現此議題，並與獨立網路媒體比較。在家庭私領域方面，疫情期間女性照顧小孩、做家事的時間較疫前更增，承受的壓力也比男性更大，心理健康值得擔憂，亦有女性成為家暴受害人。而在職場公領域方面，母親為了照顧孩子，在家工作成效不彰，或者退出勞動市場，可能影響其自身與子女未來發展，終致陷於貧窮；又或者因工作性質無法居家上班而暴露於染疫風險。本研究蒐集 2020 年 1 月起至 2021 年 7 月底之《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三家主流報紙新聞疫情與女性相關報導，以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檢視媒體再現之論述策略及意識型態（見表 3）。

表 3：主流報紙疫情報導的性別論述策略

策略	對應分析
<b>指稱</b> 女性如何被指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婆婆媽媽</li> <li>● 弱勢、受暴婦女</li> </ul>
<b>預測</b> 文本中女性被連結到哪些性狀、特徵和特點？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照顧者：利他且甘之如飴的媽媽</li> <li>● 消費者：搶購物資</li> <li>● 受害者（含確診者）：受暴婦女、確診媽媽。</li> </ul>
<b>觀點與框架</b> 命名與指稱從那個立場發出？	三種的身分框架重製父權主義觀點，建構密集母職論述
<b>立論</b> 用什麼策略將排除、歧視、壓力或剝削他者的行為正當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自然化、常態化母職勞動，略而不提男性的家庭責任</li> <li>● 強調家暴激增受害女性待援助，但未提及究責與犯罪的防阻</li> <li>● 相關議題置於副刊，貶低女性經驗的重要性</li> <li>● 報導數量稀少，忽略性別落差現象</li> </ul>
<b>緩和與強化</b> 用什麼策略來強化或淡化論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強化媽媽無私付出的形象，照顧家人</li> <li>● 為家暴加害者提供藉口：因生計困頓、摩擦增加</li> <li>● 女性的壓力與焦慮是個人問題，應靠自己解決</li> </ul>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本研究發現，在此一年七個月疫情期間，各報涉及女性處境的新聞非常稀少，僅約千分之一，且在論述策略上，強化父權主義的刻板印象。在指稱與預測策略上，「婆婆媽媽」常用作統稱來指涉母親、媽媽等身分女性，報導常將她們連結為輕信網路傳言，瘋狂搶購物資、囤積口罩的消費者，或是主動製作布口罩的照顧者。當提到受暴婦女時，他們沒有主動發言的機會，而是統計數字中的群體，由他人稱及化名（如小嫻、小芳）並描述其境況。照顧者、消費者、受害者

（含確診者）是三種最常出現的身份框架，而這些框架經常是重疊的，例如不辭辛苦排隊代買口罩、搶購物資，擔任志工製作布口罩（消費者、照顧者），或媽媽確診被即刻送醫而留下無人照顧的孩童（照顧者、受害者）……等。這些指稱與特質都連結到父權主義對密集母職的建構與召喚，母親是孩子唯一的照顧者，全心全力地付出但甘之如飴。

在立論策略上，報紙新聞報導「自然化」、「常態化」女性的母職勞動，疫情間性別落差議題幾乎完全被排除忽略、非主流化。脫離勞動市場的媽媽缺乏公共經驗，所以眼界狹隘、執著於家庭瑣事，容易自尋煩惱。媒體未以追查犯罪的角度來報導家暴新聞，僅將受暴婦女視為社會底層、亟待援助的無聲受害者。疫情中與性別相關議題之報紙新聞非常稀少，且半數以上來自外電、地方版面、家庭健康副刊等，顯示此主題對新聞編輯室而言，僅以女性為目標讀者，無法擠進重要議題之列。而副刊中少數關懷婦女心理健康之文章，強調婦女要放開心胸、尋求幸福，卻未能質疑現狀。換言之，臺灣主要報紙將疫情間的性別落差視為不具新聞價值的既存事實，淡化並緩和了女性須負擔主要照顧責任卻不受尊重的處境，強化媽媽無私付出的形象；疫情生計困頓成了家暴加害者的藉口，將女性的壓力與焦慮視為個人問題，卻忽略社會性、制度性的討論，也放任了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在危機中擴張。

從新聞學的角度來檢視，報紙因版面有限，報導傾向將資源投以突發事件、消息發布等新聞供給來源。Tuchman（1976）認為，能否近用（access）新聞，使事件與想法被報導，與社會資源有關。因此機構、運動都想引起記者注意，而能否被報導，常是政治與經濟權力運作的結果。從新聞作業慣例來分析，新聞記者進入組織後，以主跑路線（beats）做責任分區（Becker & Vlad, 2009; Fishman, 1980），記者在路線上的相關場所活動，並與消息來源互動，以採集報導新聞。眾多女性遭受疫情收入中輟、身心健康受創，但她們分散於社會各角落，缺乏與新聞媒體直接互動的管道，而尋常家庭的媽媽們因疫情遭受沉重壓力的現象，更難獲得注目。性別落差相關新聞被置於次要版面，反映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以及女性長期被權力結構邊緣化的現象。

相較之下，國際媒體更重視性別落差議題及女性處境。而《關鍵

評論網》、《新頭殼》與《風傳媒》三家獨立網路媒體，在規模、資本與人力上均無法與主流報社競爭，故利用策略聯盟豐富內容，增加國際議題以區隔目標讀者市場。網路媒體對性別議題的報導，雖然數量仍然稀少，但內容較為持平。網路媒體新聞主動規劃議題的策略，較報紙新聞更能以性別角度檢視疫情造成的不平等，突破路線與慣例的限制。經比較後發現，臺灣報紙傾向報導新聞事件，對於性別落差這類長期存在、又無利益團體倡議的結構性現象，缺乏自主意識與深度報導，容易依循社會既有觀點規劃敘事，以致被主流意識型態收編，失去積極倡議改變的能動性。

女性遭遇的困境絕不只是女性個人的問題，如 Hays (1998, p. 2) 引用 C. Wright Mills 的名言「個人困境實際上與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緊緊相連」，女性的生活經驗反映出整體結構的問題，不應被輕忽以待。England (2010) 評論 80 年代後停滯且發展不均衡的性別革命，女性積極往專業領域移動且表現傑出，但因為傳統上被歸類為女性工作的照顧與再生產活動，持續被貶抑且報酬太低，男性缺乏動力進入此領域。若能從政策上給予協助，新聞媒體關注此議題，讓「照顧工作成為體面工作」，兩性「跨界」更加流暢，將有助於改善家戶內分工極端不均，及其所衍生的性別落差問題。

媒體與政策經常相互強化，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聯合國婦女署 (United Nations, 2020) 建議，政府應關心女性在疫情中所遭受的社會與經濟衝擊。即時措施可從經濟與健康方面著手。經濟方面，由政府直接對女性紓困，減輕女性個人與中小企業主的交易、營運與融資成本；健康方面，政府須注意到，有償與無償照顧工作者處在高風險工作環境，提供他們充足資訊、財務與資源的補助，包括女性生理用品，並協助照顧家中幼童、病患與老人，推廣兩性家事分擔。更長遠而言，需投資並推廣照護科技，減輕女性照顧者負擔，並提升照顧者的社會地位。這些建議對臺灣都深具啟發，政府是媒體主要消息來源，若能以性別角度思考紓困政策，負起議題建構之責任，將引導媒體更重視此現象，喚起社會大眾之重視，並扭轉刻板印象與父權價值，重新塑造文化框架。

儘管紙本媒體刻正面臨巨大的經營危機，但報紙仍是可信度高且具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如同 Picard (2014) 指出，小眾媒體網站無法做到傳統媒體的廣泛布點，當代社會需求的資訊範圍與規模既大且



廣，我們依舊需要大型新聞機構來蒐集、策展、分析時事。本研究藉由批判論述分析，發現疫情期間報紙媒體強化既有刻板印象，令既有的性別落差更加放大，可能是受限於傳統路線分工，過度依賴消息來源所致。當前正值多家新聞媒體推出訂閱制、市場秩序變動之際，深刻有觀點的內容將有助於吸引讀者，建議報紙可更積極吸取國際媒體值得參照的觀點，並學習網路媒體擴大關懷視野，擺脫僵化的路線，主動建構議題，期許主流媒體更能自省，並積極發揮影響力。

過往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常批評，主流媒體被政治經濟勢力收編，淪為共識製造機（Herman & Chomsky, 2002）。本研究從 Walby（2011）提出複雜理論中的「交會」概念來理解性別不平等與其他系統交疊的關係，新聞媒體鑲嵌在社會關係網絡中，固然受到既有權力牽引，但也可能利用其位居交會節點的有利位置，透過再現議題之契機發揮影響力，進而促成結構改變。根深柢固的性別文化結構其來有自，但並非不可撼動，若新聞媒體與政府更能意識到現有結構的缺點，仍有機會推動改變，改善性別正義。

礙於疫情期間的防疫要求，本文寫作期間未能親身訪談到受影響婦女的親身感受，以及第一線媒體記者實際工作時的考量，建議未來研究持續耕耘此主題，以利性別落差問題更受重視，進一步重塑社會文化的長久偏差。

## 註釋

- 1 包含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羅馬尼亞和希臘。

## 參考書目

- 王雅玄（2005）。〈社會領域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論的重建〉，《教育研究集刊》，51(2)：67-97。
- 中央銀行（2020年9月17日）。〈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後記者會簡報〉。取自 <https://www.cbc.gov.tw/tw/dl-157263-496f6f5325134aecacf8a420d904874c.html>
- 平兩晨（2021）。〈我 OK，我也排：排隊買口罩的密集回應需求母職〉，《文化研究季刊》，173：1-20。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 105 年》。臺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0年5月13日）。〈政院：穩就業、護弱勢階段成果良好 臺灣可突破難關〉。（五月十三日新聞稿）【公告】。臺北：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取自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39893fda-da22-4403-91d0-0b029f7e6037>
- 行政院（2020年8月31日）。〈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行政院施政報告〉【公告】。臺北：行政院。取自 <https://www.ey.gov.tw/File/996B222871C44F8C/4b25be34-94b7-4719-847e-ed0a6324472e?A=C>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年11月27日）。〈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十一月廿七日新聞稿）【公告】。臺北：行政院主計總處。取自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6566&ctNode=497&mp=4>
-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21年6月3日）。〈行政院公布「紓困 4.0」方案 蘇揆：全國一心、守住疫情、紓解困境〉。（六月三日新聞稿）【公告】。臺北：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取自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c72437bf-5e98-4af4-a535-f2a6c57420fd>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年7月22日）。〈110年6月暨上半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結果〉。（七月廿二日新聞稿）【公告】。臺北：行政院主計總處。取自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172218508DBUFBVDH.pdf>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年10月4日）。〈國情統計通報第187號－109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被害人數增10.1%〉【公告】。臺

- 北：行政院主計總處。取自 <https://www1.stat.gov.tw/public/Data/11041612119819Z1K.pdf>
- 吳商平（2020）。〈後疫情時代之女性經濟賦權挑戰〉，《臺灣經濟研究月刊》，43(11)：113-119。
- 吳嘉苓（2020）。〈全球疫情與性別視野〉，《婦研縱橫》，113：6-9。doi: 10.6256/FWGS.202010\_(113).02
- 邱琮皓（2021年7月9日）。〈無薪假再攀高 史上最慘烈〉，《工商時報》。取自 <https://ctee.com.tw/news/policy/486118.html>
- 桑德琳·隆貢布（Sandrine Lungumbu）、阿梅莉亞·巴特（Amelia Butterly）（2020年11月30日）。〈疫情與性別：女性承擔的更多瑣事和受到威脅的性別平等〉，《BBC News 中文》。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085114>
- 陳美君（2020年9月21日）。〈K型復甦 拉大貧富差距〉，《經濟日報》。A10版。
- 婦女新知基金會（2021年5月25日）〈【聯合聲明】紓困勿忘照顧者！呼籲政府提供防疫照顧假津貼、工作風險津貼 給予各類公共服務人員防疫支援及托育長照服務〉。（五月廿八日新聞稿）【公告】。臺北：婦女新知基金會。取自 <https://www.awakening.org.tw/news/5596>
- 婦女新知基金會（2021年5月28日）。〈【聲明】行政院「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一次性現金效果有限 國家應以「防疫照顧假」津貼制度性分擔家庭的照顧責任〉。（五月廿八日新聞稿）【公告】。臺北：婦女新知基金會。取自 <https://www.awakening.org.tw/news/5597>
- 許碧純、邱皓政（2015）。〈照顧子女的代價：母職對臺灣女性薪資影響的貫時性分析〉，《臺灣社會學刊》，56：55-115。
-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21）。〈新聞媒體篇與新聞資訊類網站使用概況〉，《創市際雙週刊》，172。取自：<https://www.ixresearch.com/category/reports/bi-weekly/page/4/>
- 蔡思培（2020年12月28日）。〈疫情重創9年最慘 北市近4千人丟飯碗〉，《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21750>
- 競業信息（2021）。〈2021年第二季【潤利艾克曼公司】媒體大調查

- 報告〉。取自潤利艾克曼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網頁  
<https://www.xkm.com.tw/HTML/XKMsite/information.html>
- Acker, J.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 Society*, 4(2), 139-158.
- Allan, S. (1998). (En)gendering the truth politics of news discourse. In C. Carter, G. Branston, & S. Allan (Eds.), *News, gender and power* (pp. 121-137). Oxon, UK: Routledge.
- Addati, L., Cattaneo, U., Esquivel, V., & Valarino, I. (2018). *Care works and care jobs for the future of decent work*. Retrieved from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ebsite: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33135/lang--en/index.htm](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633135/lang--en/index.htm)
- Andrews, K. T., & Caren, N. (2010). Making the news: Movement organizations,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public agend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6), 841-866. doi: 10.1177/0003122410386689
- Alon, T., Doepke, M., Olmstead-Rumsey, J., & Tertilt, M.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gender equality* (No. w26947). Retrieved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947>
- Altintas, E., & Sullivan, O. (2016). Fifty years of change updated: Cross-national gender convergence in housework. *Demographic Research*, 35, 455-470. doi: 10.4054/DemRes.2016.35.16
- Bariola, N., & Collins, C. (2021).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pandemic relief: Labor and family policies in Denmark,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COVID-19.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5(12), 1671-1697. doi: 10.1177/00027642211003140
- Baran, S. J., & Davis, D. K. (2012).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6th ed.).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 Becker, L. B., & Vlad, T. (2009). News organizations and routines.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laskó, Z., Papadimitriou, E., & Manca, A. R. (2020). *How will the COVID-19 crisis affect existing gender divides in Europe?* Retrieved from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website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60/37511>
- Brown, S. (2014). Intensive mothering as an adaptive response to our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L. R. Ennis (Ed.), *Intensive mothering: The cultural*

-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motherhood* (pp. 27-46). Bradford, CA: Demeter Press.
- Clark, S., McGrane, A., Boyle, N., Joksimovic, N., Burke, L., Rock, N., & O'Sullivan, K. (2021). "You're a teacher you're a mother, you're a worker": Gender inequality during COVID-19 in Ireland.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8(4), 1352-1362. doi: 10.1111/gwao.12611
- Collins, C. (2019). *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raig, L. (2020). Coronavirus, domestic labour and care: Gendered roles locked down. *Journal of Sociology*, 55(4), 684-692. doi: 10.1177/1440783320942413
- Czymara, C. S., Langenkamp, A., & Cano, T. (2020). Cause for concerns: gender inequality in experienc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eties*, 23(1), S68-S81. doi: 10.1080/14616696.2020.1808692
- Dias, F. A., Chance, J., & Buchanan, A. (2020). The motherhood penalty and the father premium employment during covid-19: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69, 1-4. doi: 10.1016/j.rssm.2020.100542
- Diallo, B., Qayum, S., & Staab, S. (2020). *COVID-19 and the care economy: Immediate ac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or a gender-responsive recovery*. Retrieved from UN WOMEN website: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20/06/policy-brief-covid-19-and-the-care-economy>
- England, P. (2010). The gender revolution: Uneven and stalled. *Gender & Society*, 24(2), 149-166.
- Ertan, D., El-Hage, W., Thierrée, S., Javelot, H., & Hingray, C. (2020). COVID-19: urgency for distancing from domestic viol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11(1), 1-6. doi: 10.1080/20008198.2020.1800245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aludi, S. (1991).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NY: Crown Publishers.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Harlow, UK: Longman.
- Fortier, N. (2020). COVID-19,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10(3), 77-93. doi: 10.5502/ijw.v10i3.1305
- Fodor, É., Gregor, A., Koltai, J., & Kováts, E.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childcare work in Hungary. *European Societies*, 23(1), S95-S110. doi: 10.1080/14616696.2020.1817522
- Fuller, S., & Qian, Y., (2021). Covid-19 and the gender gap in employment among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in Canada. *Gender & Society*, 35(2), 206-217.
-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2020). Who makes the news: *6th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Retrieved from [https://whomakesthe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GMMP2020.ENG\\_FINAL20210713.pdf](https://whomakesthe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GMMP2020.ENG_FINAL20210713.pdf)
- Greaves, L., Pederson, A., Varcoe, C., Poole, N., Morrow, M., Johnson, J., & Irwin, L. (2004). Mothering under duress: Women caught in a web of discourse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 6(1), 16-27. Retrieved from <https://jarm.journals.yorku.ca/index.php/jarm/article/view/4882/4076>
- Hays, S. (1998).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rtz, R. (2013). Mothering, ideologies of. In V. Smith (Ed.), *Sociology of Work: An Encyclopedia* (pp. 607-61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rman, E. S., & Chomsky, N.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K: Pantheon Books.
- Holland, P. (1998). The politics of the smile: 'Soft news' and the sexualisation of the popular press. In C. Carter, G. Branston, & S. Allan (Eds.), *News, gender and power* (pp. 17-32). Oxon, UK: Routledge.
- Kassova, L. (2020). *The missing perspectives of women in COVID-19 news: A special report on women's under-representation in news media*. Retrieved from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website: <https://www.iwmf.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2020.09.23-The-Missing-Perspectives-of-Women-in-COVID-19-News.pdf>
- Kuperberg, A., & Stone, P. (2008). The media depiction of women who opt out. *Gender & Society*, 22(4), 497-517.
- Manzo, L. K. C., & Minello, A. (2020). Mothers, childcare duties, and remote working under COVID-19 lockdown in Italy: 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car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10(2), 120-123. doi: 10.1177/2043820620934268
-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2), 176-187.
- McLaren, H. J., Wong, K. R., Nguyen, K. N., & Mahamadachchi, K. N. D. (2020). Covid-19 and women's triple burden: Vignettes from Sri Lanka, Malaysia, Vietnam and Australia. *Social Sciences*, 9(5), 1-11. doi: 10.3390/socsci9050087
- McRobbie, A. (2009).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UK: Sage.
- Mooi-Reci, I., & Risman, B. J. (2021).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COVID-19: Lessons and reflections. *Gender & Society*, 35(2), 161-167. doi: 10.1177/08912432211001305
- Moser, C. (1993). *Gend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ory, practice & training*. London, UK: Routledge.
- Motro, J., & Vanneman, R. (2015). The 1990s shift in the media portrayal of working mothers. *Sociological Forum*, 30(4), 1017-1037.
- Nettleton, P. H. (2011). Domestic violence in men's and women's magazines: Women are guilty of choosing the wrong men, men are not guilty of hitting women.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4(2), 139-160. doi: 10.1080/07491409.2011.618240
- Norton, M. (2014). Classification and coercion: The destruction of piracy in the English maritime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6), 1537-1575.
- North, L. (2016) The gender of "soft" and "hard"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7(3), 356-373.
- Orgad, S., & De Benedictis, S. (2015). The 'stay-at-home' mother, postfeminism and neoliberalism: Content analysis of UK news cover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4), 418-436. doi: 10.1177/0267323115586724
- Petts, R. J., Carlson, D. L., & Pepin, J. R. (2021). A gendered pandemic: Childcare, homeschooling and parents' employment during Covid-19.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8(S2), 515-534. doi: 10.1111/gwao.12614
- Picard, R. G. (2014).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Evidence from the changing news ecosystem. *Journalism Studies*, 8(5), 488-498. doi: 0.1080/17512786.2014.905338
- Power, K.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ncreased the care burden of women and familie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and Policy*, 16(1), 67-73. doi: 10.1080/15487733.2020.1776561

- Priola, V., & Pecis, L. (2020). Missing voices: The absence of women from Italy's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Gender in Management*, 35(7/8), 619-627. doi: 10.1108/GM-07-2020-0218
- Reisigl, M., & Wodak, R. (2000).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UK: Routledge.
- Reisch, L. A. (2001). The Internet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erspectives on a Janus face.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4(3), 251-286.
- Ross, K., & Carter C. (2011). Women and news: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8), 1148-1165.
- Schultz, I. (1993). Women and wast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4(2), 51-63. doi: 10.1080/10455759309358543
- Sjøvaag, H. (2015). Hard news/soft news: The hierarchy of genr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profession. In M. Carlson & S. C. Lewis (Eds.),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p. 101-117). Oxon, UK: Routledge.
- Stevano, S., Mezzadri, A., Lombardozi, L., & Bargawi, H. (2021). Hidden Abodes in Plain Sight: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Households and Labor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Feminist Economics*, 27(1-2), 271-287. doi: 10.1080/13545701.2020.1854478
-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 Tuchman, G. (1976). The news' manufacture of sociological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6), 1065-1067.
- United Nations (2020). *Policy brie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 Retrieved from <https://unsdg.un.org/download/2066/29505>
- Vinz, D. (2009). Gender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 germ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6(2), 159-179. doi: 10.1177/1350506808101764
- Walby, S. (2007). Complexity theory, systems theory, and multiple intersec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7(4), 449-470.
- Walby, S. (2009).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ies: Complexity and contested modernities*. London, UK: Sage.
- Walby, S. (2011). Globalization and multiple inequalities. In E. N. Chow, M. T. Segal, & L. Tan (Eds.), *Analyzing gender, intersectionality, and multiple inequalities: Global, transnational and local contexts* (pp. 17-33).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Walby, S., Armstrong, J., & Strid, S. (2012). Intersectionality: Multiple



- inequalities in social theory. *Sociology*, 46(2), 224-240.
- Wallace, R., & Goodyear-Grant, E. (2020). News coverage of child care during COVID-19: Where are women and gender? *Politics & Gender*, 16(4), 1123-1130.
- Wang, S. (2016). Green practices are gendered: Exploring gender inequality caused by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olicies in Taiwan.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18, 88-95. doi: 10.1016/j.erss.2016.03.005
-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63-94). London, UK: Sage.
- Wodak, R., & Meyer, M. (2009). *Method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London, UK: Sage.
- Wright, E. O. (2009). Preface. In J. Gornick & M. Meyers (Eds.), *Gender equality: Transforming family divisions of labor* (pp. vii-viii). New York, NY: Verso.
- Yamamura, E., & Tsustsui, Y. (2021). School closures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in Jap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4, 1261-1298. doi: 10.1007/s00148-021-00844-3
- Yerkes, M. A., André, S. C. H., Besamusca, J. W., Kruyen, P. M., Remery, C. L. H. S., van der Zwan, R., Geurts, S. A. E. (2020). 'Intelligent' lockdown, intelligent effects? Results from a survey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paid work, the division of childcare and household work,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parents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PLoS One*, 15(11). doi: 10.1371/journal.pone.0242249
- Yun, H. J., Postelnicu, M., Ramoutar, N., & Kaid, L. L. (2007). Where is she? Coverage of women in online news magazines. *Journalism Studies*, 8(6), 930-947. doi: 10.1080/14616700701556823

# Women and Covid-19: Gender Inequality and News Represent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Sumei Wang\*

##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is gender-specific. Women are more susceptible than men to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f Covid-19. Since the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rates of unemployment among women have increased. They have been required to spend more time attending to children and household chores and have experienced more domestic violence because of stay-home restrictions. This study employ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reports on three Taiwanese news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January 2020 and July 2021.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women were not represented sufficiently and that the issues of gender inequality were marginalized. The analysis also revealed that patriarchal ideology still dominates society; therefore, women's contribution to care work is taken for granted. This study urges Taiwanese newspapers to account for women's needs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Keywords:** women, mothers, gender inequality, relief policies, news discourse, Covid-19

---

\* Sumei Wang is Professor of Media Stud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